

← (上接2版)

## 钢和泰引导沈仲章 (下):协助翻译佛经

大约在1928年,钢和泰推荐沈仲章替一位德国学者当助手,参与翻译佛经的项目。钢和泰挑选沈仲章,是因为这个中国青年既懂梵文,也通德文,还具有佛学知识等等。

父亲在北大第一年,修过熊十力和邓高镜等教授的佛学专题课,第二年又修了陈寅恪的“佛典翻译研究”(亦作“佛经翻译文学”)。慕名去听寅恪先生课的人很多,真能跟上老师速度的学生为数不多。父亲因有梵文和多种外语的基础,听得过瘾,每堂课能记一厚本笔记。(参见《沈仲章与陈寅恪之缘》)。

自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,父亲向我津津乐道那段助译佛经的往事,不下十来次。回想父亲言及项目内容,用过泛称“翻译佛经”,也用过确指“翻译《六祖坛经》”,偶尔也用“编(佛学)词典”。而提到被助者,多冠以“德国教授”或“德国学者”,曾点明“Wilhelm”,也不时说“帮钢和泰”或“跟钢和泰他们一起”译经。

父亲回忆,那位德国教授极其认真,做研究非常严谨。他要求沈仲章,把《六祖坛经》“一个字一个字抄下来做卡片”(父亲这么说)。每个字都加上大量注释,从字音、字形、字义、字源、历史演变等多方面考查。我的理解是,父亲逐个汉字做卡片,用外文详细注解。我忘了问是用德文还是英文,估计含德文。(如果猜对,看来父亲也有些德文写作能力。)记得父亲曾评论,那是极

导作用,因此说帮“钢和泰(他们)”也合理。当然也不排除另一可能,父亲还曾直接助理钢和泰本人。至于Wilhelm,是本文关注重点,容我从下节起,一步步探讨。

父亲去世后,我生出一个疑问:翻译中国土产的《六祖坛经》,为什么需要懂梵文?我曾向几位学者求教,大都与我一同存疑。最终有一位解疑,他说:不少汉传佛学词汇,看起来是中文,按字面也能读通,但其实含有梵文渊源。佛教融入中国文化年久,人们乃至佛门人或研究者,难免习焉而不察焉。若具梵文功底,则较易辨析溯源。他追加说:另一方面,为解析这些梵文借词之汉传演化,中文语言学知识也必不可少。接着,他邀我得空合作,考查《六祖坛经》中梵文借词及其汉化,理由之一就是“你爸爸曾做的事”。这位学者早已准备了《六祖坛经》梵文借词参考物,可惜多年过去,我还没得空。

回头说父亲,他考进北大,选科是物理。涉足偏冷深奥的古典语言,原本学着玩。却没想到,梵文居然给他这个穷学生带来一条生财之路。父亲一星期去德国教授那儿几次,每次工作几小时。老板出手大方,一次给二十几块大洋。父亲成了年轻人中的阔佬,忙毕回宿舍,便得散财款待朋友们。(趣事参见拙文《父亲说老北大的“吃”》,载《文汇报》2016年7月26日)

这份研究助理的工作,持续了半年多。除了治学上的熏陶和经济上的获益,这宗“洋买卖”在很多年后,还带来了个大好处。原来,德国教授付酬用德国银行支票,只能到德华银行去储存或兑现。为此,父亲在德华银行开了账户。因每星期去,成了“熟面孔”,建立了信誉。1937年夏,日军入侵北平,父亲冒险把



► Hullmut Wilhelm(卫德明)和其子 Crispin, 1950年代;Crispin Wilhelm 提供



▲ David Knechtges (康达维),本人提供

◀ 徐文堪,2014年,沈亚明摄,徐文堪提供

### 哪个 Wilhelm: 父还是子?

2014年或更早,我起念动笔,写写父亲助人译经之事。

我碰到一个问题,不议钢和泰,父亲协助的那位德国教授是谁?我先认为就是“Wilhelm”,可早年在北京大学当过德文教授的,有两个 Wilhelm,是父与子。为父者 Richard Wilhelm,即卫礼贤;其长子 Hellmut Wilhelm(1905—1990),中文名卫德明。沈仲章当过哪个 Wilhelm 的助手呢?

扫视卫氏父子各自著述标题,未见明显涉佛。浏览若干生平介绍,也无我需要的信息。为解答疑问,2014年我踏上征程,寻找与沈仲章有缘的那位 Wilhelm。

出发之前,我就译经一事,从多次亲闻和父亲1985年口述回忆中,选辑要点和探讨之题,充作“行装”。然后借助电邮,穿越国度,拜访求教博学广闻者。

**第一站**是中国的徐文堪。凡父辈学界往事,我常请教他。徐文堪先提议 Hellmut Wilhelm,即卫德明。徐文堪的猜测基于年龄,因卫德明与沈仲章生年接近。查卫德明1948年到了美国,在华盛顿州西雅

图的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(华盛顿大学)当教授。

我折回美国,顺藤摸瓜,寻到**第二站**华盛顿大学。2014年8月15日,我电邮卫德明的学生、东亚系退休教授 David Knechtges (康达维)。我向他概述父亲回忆,告知我的困扰,寻求指教帮助。

康达维教授正要离家访问北京,但仍然拨冗作答。闻我苦于找不到有关卫氏父子佛学著述的记载,康教授说大概就是这情形,即两位 Wilhelm 都没出版任何论佛之书,至少他肯定恩师卫德明是这样(“I am sure of this in the case of Hellmut, who was my teacher.”)。至于卫礼贤,康教授因隔代缺乏直接接触,说不了太多。[沈按:本文引用交流,篇幅较长的采用概述,必要时附原文关键词语。较短的录原文,外文加注汉译大意。]

康教授答言附有卫氏父子简历,卫礼贤部分截止于1925年。估计康教授意在留个口子,以便再探1926年后卫礼贤行止。康教授读到父亲描述那位德国教授治学严谨,评论道:据卫德明,其父卫礼贤是位“最细致的学者”(“a most meticulous scholar”)

康教授确证,卫德明于1933—1948年在中国,其间在北大教过书。我知道父亲于1926—1937年在北大,1933或

1934年起,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助教,1937年离开北平。算起来,父亲与卫德明有三四年可在北平相遇,可成北大同事。1935—1937年间,父亲应约翻译斯文·赫定(Sven Hedin)著作,需参照德文和英文版本。依父亲性格,他是会有兴结识精通母语的学者的。

但是,根据我对背景的了解,比如钢和泰的任职变迁,沈仲章的兴趣更替、师友相交等等,我觉得父亲说的翻译佛经项目,应在他的学生时代。当发生于卫德明来华之前,不晚于1930年,最可能是1928年。

于是我回到父亲1985年口述笔录,这该算**第三站**。翻检笔录稍后纸页,父亲又提到翻译佛经之事。很幸运,那页笔记经父亲审读,有他亲笔加注的“卫礼贤博士”。我兴奋地通报康教授,并在电邮标题中写道:“卫礼贤 for sure (肯定)”。康教授回邮表示高兴,“卫礼贤”当就是“卫礼贤”。至此,他和我都以为,请沈仲章协助译经的德国教授,“肯定”是卫礼贤。

可是,求索离成功尚早。

引言已述,卫礼贤向西方译介儒道学说之功,知者甚众。然较通行的卫氏介绍,大都未言佛学。曾与人闲聊,我对卫礼贤涉佛之好奇,由父亲回忆触发。闻者诚曰:“记忆

(下转4版) →



沈仲章口述笔录(局部),本人审阅时填入“卫礼贤博士”。注:此处笔记写“一年”,但父亲紧接着更正,具体时长记不清。

好的训练,对他后来从事语言、考古和采风等研究,都大有帮助。

对父亲变换用词,我这样理解:大项目总题是翻译佛经,小团队阶段性专攻是《六祖坛经》。制作卡片之责,已兼编纂词典之任。父亲直接协助的是一位德国教授,而整个译经项目系列,钢和泰有策划主

居延汉简悄悄运出北大。左思右想,北平城内无处可藏。考虑德国是日本盟友,德商企业相对安全。父亲便把汉简装箱封实,充作私人物品,锁进德华银行保险柜。这段因缘,父亲讲述救护居延汉简经历,几乎总会顺带说起,故而也得在此一提。